

## “民主的种子”该以什么来灌溉？

### 读祝家华《朝向儒家德治民主：牟宗三“开出民主论”研究》

#### A Review on Thock Kiah Wah's *Towards the Virtue Democracy of Confucianism*

黎竞桢(南京大学)

Loi Chen Hwee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E-mail: 15295585233@163.com

#### 摘要

在现代化民主与后现代民主思潮的冲击下，祝家华通过儒家思想的德治民主来回应现代化民主政治。以儒家思想中所关注的道德生命，对现代化民主进行批判而超越的检视。祝氏通过研究牟宗三的“道统、政统、学统”的“开出民主论”，重新梳理德治与民主的关系，并且提出“商统”与“互动”的思辨概念来试图建构更为完善的“开出民主论”。除了对学理层面的建构与调整之外，该书亦提供“在地 / 在场”的视角，而笔者亦试图以此视角，展开观念探索与实践动力的讨论空间。

**关键词：**牟宗三、儒家民主理论、德治民主

#### Abstract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modern democracy and post-modern democracy, Thock Kiah Wah responds the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through the virtue democracy of Confucianism. He critics and inspects transcendently the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by the concept of moral life which being emphasized in Confucianism. The research that Thock did on Mou Tsung-san's concepts of "ethical authority",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scholars' authority", led him re-ident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e of virtue and democracy. He then proposes the speculative concepts of "commercial authority" and

“interactive”, in attempt to optimize Mou’s theory of “Confucian Democracy”. Apart from the construction and revision done in the level of academic theory,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ocal” and the “present” that emerged from Thock’s work also inspir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to unravel the discussion space of concep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motivation.

**Keywords:** Mou Tsung-san, Confucian Democracy, Virtue Democracy of Confucianism

祝家华《朝向儒家德治民主：牟宗三“开出民主论”研究》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2018年出版，235页。

ISBN : 978-983-2453-65-9

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人文思想，没有**民主思想之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sup>1</sup>——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中国文化宣言》

中国文化该如何面对民主政治的现代化过程，甚至是后现代的挑战，一直是关心中国文化赓续的研究者所思考的重要课题。民国初年的当代新儒家，如熊十力、牟宗三等辈，已经从各种层面来论述中国文化精神与民主政治，二者没有根本之冲突；继之而起的研究者，如林安梧、李明辉等，则更重视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如何得以实现实践的动力与条件。除了在理论建构层面的批判与反思以外，笔者也有意由此，针对祝家华博士的著作——被喻为“东南亚第一部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政治哲学的研究作品”<sup>2</sup>（郑文泉语）进行延伸思考。本文会先扼要简述本书主要阐发的问题与观点，再以“在地/场”<sup>3</sup>的视角检视本书提出的思想架构。

祝家华博士（以下简称祝氏）的著作，以牟宗三的“开出民主论”为理论基础，颇具深意的提出在牟宗三“道统、政统、学统”的“三统”架构，应该再添加“商统”，以弥补理论架构所缺乏的现实实践动力。此外，“商统”的纳入，可以解决“开出民主论”的结构弱点。祝氏深信，“内圣外王可以是儒家思想和现代民主政治接轨的主要架构”（页49），故而将其所发想的思想架构命名为“内圣外王互动四统论”，而此

<sup>1</sup> 《中国文化宣言》的全称本为《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四人联名发表在《民主评论》第9期，1958年1月1号。虽然该宣言乃唐君毅先生起草，但署名时，却是将其名字放在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之后。因此，笔者亦沿用这样的署名方式，敬重唐君毅先生的仁厚谦逊。

<sup>2</sup> 郑文泉在祝氏书里，作此推荐语，并提到祝氏“长期关注政治发展”且是“从经验角度来检验牟宗三抽象理论说法的可行度”。

<sup>3</sup> “在地”是指身在多元族群文化的马来西亚；“在场”则指东亚、东南亚儒家文化圈的场域，前者是经验性的，后者是理念性的。祝氏所论，牵涉“在地/场”的面向，而笔者也试图以自身的“在地/场”的思考来对此检视。

“商统”概念的启发，来自牟宗三 1933 年发表的《社会根本原则之确立》一文：

“经济生活”“经济现象”，“政治生活”“政治现象”，以及“精神生活”“精神现象”，这三种过程乃是互相渗透，互相为命，互不可缺，谁缺谁就不成为一个整个的网状组织之整体。这个网状的整体由那个根本的社会事素之发展过程而结构出，而那三种生活过程即是那个根本的生活过程之分化之昭示不同的宣表。同出一源而列为三支；然而三支必互相渗透而不可或缺。这三个支流不作任何偏面的规定，而互相结合被那个根本过程所决定或规定。这最是全的，过程的动的，具体的看法。<sup>4</sup>

祝氏从牟宗三早期的文章中，得知牟宗三在回应马克思《资本论》里有关“基础建筑”的概念时，并不否定“经济生活 / 现象”，并且提出“经济 / 政治 / 精神”是“互相渗透，互不可缺”的分析。祝氏有感后期的牟宗三再无相关论述，因而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回复牟先生早年的思考”（页 58），由此展开“内圣外王互动四统论”的建构。与其说是“回复”，亦可以说是沿着牟宗三的思路来“接着讲”。然而，“接着讲”必须从省思结构性弱点，以及如何面对结构性弱点这两个视角来展开。以下将论述之。

（一）祝氏在整理熊十力的“内圣直通外王”以及牟宗三“内圣曲通外王”的思路脉络后，以“互动”来安置“内圣”与“外王”的位置，以避免过于内倾的封闭，而有“良知的傲慢”<sup>5</sup>（余英时语），进而离“外王”的实践动力愈远。祝氏在吸收许多学者针对牟宗三“泛道德主义”倾向的批评之后，提出“互动”的构想，避免本心、心性或内圣完全自足的封闭，以客观事物的“外王”作为“互动”的理论资源，进而对“内圣”达到“扩而充之”的调整作用。而支撑着沟通作用的“互动”，需要以开放的空间接受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生物学、社会生物学等知识，以进行整合且互动的思考体系，使得“心性之学”可以与“经世之学”在互动的调整中完成。如祝氏引论的，美国哲学家孟旦（Donald J. Munro）提出的“心灵和基因共同演化”，借用生物学基因演化的知识以结合孟子学说，得出“利他主义起始于家庭”的人性本善的伦理道德共识；以及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的“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的模式——在“个人心灵——社会心灵——文化选择——基因变迁——发生学——学习认知——个人心灵”的演化模式当中，个人、社会、文化与基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祝氏以开放的知识资源来补充“互动”的内容，打开“内圣外王”的内在涵摄与自我调整，可以说是在学理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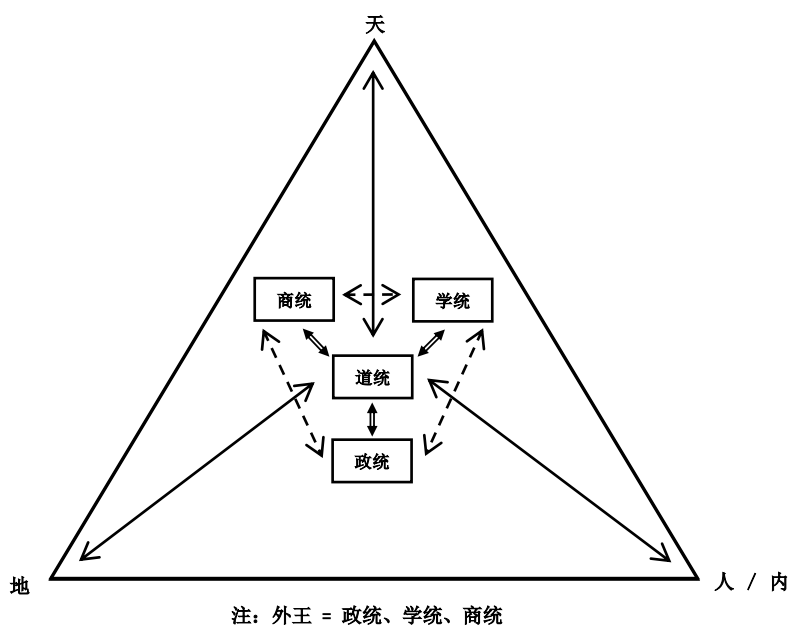
---

<sup>4</sup> 牟宗三，〈社会根本原则之确立〉，《再生》第 1 卷第 11 期（1933 年 3 月 20 日），页 61。

<sup>5</sup> 余英时，〈钱穆和新儒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1991），页 95。

疏通了儒学义理实践的论述条件。（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有关“直通”、“曲通”与“互动”的论证）

（二）祝氏沿用李普塞(Seymour M. Lipset)、道尔(Robert A. Dahl)及亨尔顿(Samuel P. Huntington)相关的经济发展结构，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的论述，当中包括李普塞的高度城市化可以提升中产阶级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成长；道尔的研究指出经济发展与多元政治的因果关系，如“经济进步——导致——多元社会结构——导致——要求竞争性政治制度”，分析出经济结构的开放可以促进多元社会与多元政治的可能；亨尔顿的“经济发展将引导一个国家进入一种情境——让政治精英以及当时的政治价值观左右选择的模式——而这选择的模式将决定性的影响了国家的演变”中，经济发展刺激政治价值观的选择模式。祝氏在此三者的论述基础上，提出孟子不排除经济思维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sup>6</sup>（《孟子·滕文公上》）的儒学脉络，论证出将“商统”纳入牟宗三的“三统”“开出民主论”是有理论建设的内在需要，能补足只有“政”而无“商”的“开出民主论”中的理论操作困境。（详见本书第五章中，政治民主化理论与经济结构的关系）下图为祝氏在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互动四统论”架构图：



<sup>6</sup> 夏延章等译，《四书今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页 97。

以上二者论述中的“互动”与“商统”，乃是祝氏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与论点，尤其是“商统”，更是其立论新意之所在。其所面对的理论挑战，与当代新儒学研究者如林安梧、李明辉等的学术关注相同，在于如何在“批判的儒学”中继承、诠释与再建设。唯有一个意犹未尽之处，在于该书运用大篇幅来论述“商统”纳入“三统”与“开出民主论”理论架构的合理性，及其所对应的政治民主化的现实脉络，却鲜少着墨于儒学资源如何支撑“商统”本身的内容。虽然祝氏有提及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作为补充，笔者以为，或可以再上溯孔子的“富之教之”，以及孟子后世有关义利之辩的论述，以此作为“商统”内容本身的补充，些许更能全面全景地展开儒学内部资源的“商统”脉络，并且丰富“商统”在“内圣外王互动四统论”架构中的意义。

除了以上二者对于学理层面的建构与调整，祝氏也深知，“德治民主”的另一层挑战即是“幽暗意识”——人性本善之余，人性多元与复杂，甚至阴暗的一面，才是人的全貌。祝氏书中少有提及“幽暗意识”的安放与限制，只做出两层分析：一、正视圣王精神中所蕴含的幽暗意识，导致中国文化历史中对于“民主”的想法，多着重在君王的“为民作主”而非“民为主”（页 96）；二、以儒家“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来说明儒家并非否认幽暗意识，而是更注重存养“几希”之“善本”和“善端”（页 132）。在以上两层分析之后，祝氏以“当代新儒家的发展须从它的形上学性格走向形下的生活世界，借助心理学、生命学、以及身心能量学等等，来建构接近于真实的‘新内圣’或‘新主体’”（页 133），以及悬置一个在“新内圣/主体”建设中的“空性主体”和“无的主体性”概念，但却因“‘空性主体’概念或会引起争议，且需要更多的阐发来丰富其立论，但此非本论文的重点，故在此不多作论述”（页 69），导致无法继续对此概念进行内容补充与架构安排。笔者虽能理解论文之篇幅所限，以及“互动”与“商统”对于客观实践动力的积极意义，但文中却无法以空悬的“空性主体”、“无的主体性”、“新内圣”、“新主体”等概念来解决“幽暗意识”的问题。若无法以空悬的概念来安置“幽暗意识”，那么如何能够以此空悬的概念所支撑的“道统”来统摄“政统”呢？如前图所示，祝氏沿用牟宗三的理论架构中，道统具有绝对位置：道统对于政统、学统是统摄或“隶属关系”（sub-ordination），而政统和学统之间是“对列之局”，绝对位置的“道统”若无实质的对于幽暗意识的安顿与限制有妥善的说明，就有可能在难以安放与限制的情况下，再次形成“道统”的“主体封闭性”以及“政统”等的反客为主，以“政治”的内容轻易动摇空悬的“空性主体”、“无的主体性”。

因此，关于祝氏沿用“道统”统摄“政统”的架构，并且进一步赞同贝淡宁（Daniel Bell）《二十一世纪的儒教民主制》中考试竞争选拔学者上议院，而提出自身发想：“道统院”、“良知上议院”，“如果道统要在现实上统摄政统，那么一个象征道统或良知

的上议院和完全民选的下议院之制度设计，是一个可能的途径”（页 178），并且以道统院或良知上议院来规范、约束及指导完全民选的下议院，如此论述，不禁令笔者延伸思考：若是将绝对的“道德”作为统摄政治的理论安排，道德对于公、私领域的干涉界限该由什么来限制与规范？依祝氏所论，似乎仅将“德治”限于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如何能代表跨文化、语言、族群的“道德”而成就“德治”？

有鉴于祝氏乃政治研究出身，亦常关注马来西亚政治，且著有许多时事政论文章，此书所研究的主题亦包含了其深层关怀意识，那即是“东亚儒家文化圈”，或“东南亚华文圈”的文化应该如何应对政治现代化冲击，这不可谓不是良心用苦。祝氏的学识与关怀背景可以分为“在场”与“在地”：1990 年负笈台湾政治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2002 年考获政治学博士，且常在课余参加台湾民间书院的经典课程<sup>7</sup>，其学识的养成乃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在场”；在马来西亚则积极投入公共事务，具有丰富的“在地”经验，担任过《亚洲周刊》驻马特派员、华社研究中心学术董事、南方学院院长。但若究其学识与关怀背景，“内圣外王互动四统论”是否能够对应大马华社的思想困境且具有启发作用<sup>8</sup>，或许还尚待各种细论。熟知政治学的祝氏，于书中也清楚辨析后现代政治思潮中，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的“同一性”的纠正，如：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意见政治学”与“真理政治学”中，前者较具根据个案的意见来判断，且留有修正调整的政治空间；以及欧苏利文（O’Sullivan Noel）“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的一体两面，以开放的、非排除性的民主形式来取代基本认同的同一性，以应付多元认同焦虑而衍生的现代政治危机。也因此，牟宗三等辈所思索的中国文化思想，无疑是在“现代化”的思潮与时代背景中所给予的应对，而尚未有足够的条件提供思想资源于现今的“后现代转折”思潮，祝氏论述之难处，亦正在此。若祝氏仍然沿袭牟宗三思想架构中，“道统”的绝对性位置，而且是维持“儒家的道统”的优位性，这样的理论设置或许在后现代政治思潮的“非同一性”的“认同政治”场域中，无法有效且妥善地应付多元差异的客观现实，更甚者会导致重回内圣主体的封闭性而对外“失语”。对外“失语”的理论困境，会否与祝氏所提出的“互动”概念所要达成的效果相悖？

不过，祝氏应对“后现代转折”政治思潮的立场与方式，沿用牟宗三的“超越地肯

<sup>7</sup> “当我还在念博士时，常常参与一些由个人所主持的书院所举办的短期密集课程（如老庄课程），如黄镇华所创办的德简书院。”叶金辉，《儒家文化的继往开来——祝家华博士访谈录》（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2007），页 9。

<sup>8</sup> 在本书跋文中，祝氏提及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后，经过长时间反复思考，再修改且付梓出版，已有 25 年。针对目前的民主政治时代，提到“世界需要反思儒家德治民主所蕴含的第三条路”，甚至也提及“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有着更迫切讨论的必要”，《朝向儒家德治民主：牟宗三“开出民主论”研究》，页 218。

定”，意即在认同民主政治与儒家思想没有根本冲突的“肯定”之上，提出儒家的德治、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作为批判现代化政治思潮的思想资源，建立一个能打通“社会道德”与“自然道德”的儒家道德主体，展现超越民主政治的视野。也就是再建“真理的政治学”，以“善优先于权利”的立场来纠正现代化政治危机。祝氏坚持牟宗三的“预见现代化及民主政治的负面问题，因此儒家思想才是最终的归向，同时可以作为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页 161）的想法，虽然牟宗三错开了“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语境落差”，但道德主体的深层批判与关怀，正是面对“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而有必要挺立“善”。

有关于“道德”、“善”之于社群与个人的重要性，笔者以为，其对于统摄“政统”等的重要性，应是可以多加探索的，只是“道德”、“善”虽可以儒家思想资源作为思辨的开端，但却未必以儒家思想的优位性作为同一性，或许会是让“德治民主”的讨论更具有论述空间。

这亦是符合祝氏纳入“商统”的初心，使得理论架构更具有实践动力。若实际操作涉及的实例是外延，那么内涵的少，会使外延扩大；反之，内涵的多，则会是外延缩小——在“道德”、“善”之下的“德治”会比“儒家的道德、善”之下的“德治”，更具有在多元认同政治下实践动力和操作实例的可能。“商统”的提出，若是公共性范畴的开拓，以此作为公共事务理论得以生成的论述空间，那么“政统”中的继承与“接着讲”，或许也该以政治公共性范畴的拓开为主，而未必在具体制度上的“开出”，如道统院和良知上议院。《论语·为政》中：“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把个人以外的伦理范畴，亦属于公共性范畴中的“政”，拉回至公共性范畴中的“人”、“生命”中的“政”，而非上求至“制”的建设，此不亦是符合牟宗三所批判的工具理性以及重视其“生命在其自己”<sup>9</sup>的中国文化学思历程？如牟宗三所言：

理性之外延表现是成就民主政体上的那些形式概念。现在，民主政体以及成矣，形式的自由与权力上已经平等取得矣。然则个人自己有如何？西方的理性途径没有在这里用，形式的自由与权力上的平等并过问不着个人主观生命之如何顺适调畅其自己。<sup>10</sup>

当现代化民主政治，甚至进行中的后现代转折不断地在制度上调整，以解决权力分配与监督的问题时，个人的、主观的、直观的人文生命价值观的涵养与坚持，更是契合牟宗三深层的关怀。

---

<sup>9</sup> 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台北：联经，2003），页18。

<sup>10</su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87），页158。



【征引文献】

叶金辉，《儒家文化的继往开来——祝家华博士访谈录》，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出版社，2007。

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台北：联经，2003。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台北：学生书局，1987。

牟宗三，〈社会根本原则之确立〉，《再生》第1卷第11期（1933年3月20日），页61。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台北：三民，1991。

夏延章等译，《四书今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